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各抒己见】	造反派为何闹分裂、打内战——写在文革50周年	胡 平
【人物春秋】	张春桥其人	李海文
【百家争鸣】	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读《王大宾回忆录》	东 夫
【劫后反思】	提防人性	罗点点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各抒己见】

造反派为何闹分裂、打内战——写在文革50周年

• 胡 平 •

文化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广泛的群众参与。这种广泛参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群众依据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其斗争导致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毛泽东将之戏称为“全面内战”。如何理解这场“全面内战”，无疑是理解文革的一个最有趣、也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问题。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没有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然而，“没有理由”的事情毕竟发生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比赛革命的革命》（1996年）一文里，我提出：“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参加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是为了争取承认，为了争取声望，为了证明自己革命，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对他们而言，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我想，这种观点很可以解释文革中造反派的分裂与内战。

造反派为什么要闹分裂、打内战，甚至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地步？按照当时流行的解释，其原因无非是以下三条：一是走资派的幕后挑动，二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捣乱破坏，三是造反派自身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先讲第一条。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因此，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总是把账记在走资派头上，这是当时的一个惯例。造反派打内战，每派都宣称对方组织是被走资派所操纵，扬言要揪出对方的“黑后台”。可是，大凡被认作走资派的干部，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能力去操纵群众组织。唯有最上层以及那些受到上层保护、或多或少还享有无产阶级当权派美称的干部才可能插手群众组织间的派别斗争。一般来说，文革中的全面内战，两大派都有后台。除了中央文革到处插手外，地方上的实力派（即

那些在中央有保护者和支持者的当权派)也不甘寂寞,尤其是军方。军方的立场并非一致,地方军区的立场和野战军的立场就常常不一样。群众间的派别斗争常常反映了上层各派的权力之争。只不过这里所涉及的后台或上层往往并不是所谓走资派,并不是所谓刘邓黑司令部中人。相反,在两派恶斗不休的地方,恰恰是因为双方的后台都红都硬。上层的斗争相持不下,下面的斗争也就没完没了。

再讲第二条。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文革中群众组织打派仗,最常用的策略之一就是抓对方组织中的“坏人”。人们发现,要证明对方的路线、观点有什么错是很不容易的——那常常有赖于中央直接出面表态,因此,要打压对方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从对方组织中抓出几个“坏人”。不过这种办法的效果也有限,因为各派出于自保,总是主动地把那些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或其他问题的人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每派组织都有一批政治极端分子和好斗勇狠的亡命之徒,这种人在激化两派矛盾中起了很大作用。可是依照当时的标准,要对这种人落实“坏人”的罪名也很不容易,再加上本派的偏袒保护,因此,群众组织间互相抓“坏人”,到头来坏人没抓出几个,只是更增加了双方的敌意而已。

有一派文革研究者提出所谓“社会冲突论”。他们认为,文革中群众的派别分化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前在群众中存在的潜在冲突。由于人们在文革前的政治地位不同,因此他们对原有的那套政治秩序的态度也就不同,故而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同。社会冲突论主要是用来说明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化,极少用来说明造反派内部的再分化。这无疑是该理论的重大缺陷。乍一看去,用社会冲突论去解释造反派内部的分化似乎也很有道理。我们知道,在造反派又分裂为两大派的地方,总是有一派稍温和,一派更激进;而在更激进的一派里,也常常聚集了更多的原先政治地位较低下的人。这似乎证明了在文革前政治地位越低下的人,对原有的政治秩序越不满,在文革中越是会参加造反派,在造反派中也越是激进。不过,我们若是认真考查造反派两大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推论其实未必靠得住。

以成都地区为例。早在1966年的11·13大会上,川大八二六就以更激进的态度从红卫兵成都部队中分裂出来,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川大的造反派,就其成员构成而言是和成都其他高校的造反派有着重要的区别呢?你也许会说,川大是综合性大学,所以它的学生思想更活跃也更激进。可是,为什么北京高校中最激进的却又是属于工科大学的清华井冈山呢?可见,造反派分成两派,本来是和他们的成员构成没有什么关系的。假如说到后来,在更激进的一派中聚集了更多的原先政治地位低下的人,那主要也是派别分化本身的结果,是运动进程的结果。川大八二六既然以更激进的态度向红卫兵挑战,它希望“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它需要争取更多的人到自己一边,所以,它就好比红卫兵更愿意支持那些原先被运动所排斥的人起来造反,从而也就把更多的政治地位低下者收到了自己门下。1967年2月初,八二六派冲击成都军区,其后军方出面镇反,锋芒所向,不只是参加过冲击军区的八二六和兵团,而且还扩大到其他造反派,尤其是那些所谓成分不纯的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八二六翻身,先前一同遭镇压的那些成分不纯的造反派也跟着翻了身,于是,许多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归依到八二六的旗下。在运动进程中,激进派和社会地位低下者再一次落入共同的处境,这就进一步促成了两者的结盟。社会冲突论把原政治地位低下者更多的进入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一事完全解释为他们的主动选择,其实那主要是形势演变和他们被动选择的结果。

照我看来,造反派闹分裂、打内战,其源盖出于竞争,出于比赛革命。

我们知道,造反派闹分裂,大抵都发生在联合阶段,或者发生在1966年秋,各造反组织成立全市性的统一司令部;或者发生在1967年一月风暴,各造反派开展联合夺权;

或者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天，中央号召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这就是说，越是在要求联合的时候，反而越容易产生分裂。

道理很简单，一旦要联合，免不了就要提出席位问题、名次问题、主从问题。这就引出麻烦了。有的组织自恃劳苦功高，企图在联合中占据首席，不料引起其他组织反弹，后者联合起来反倒排斥了前者，前者便脱离联合独树一帜。有的组织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资本可以在联合中当老大，但又不甘心让别人站在自己前头，于是就找个理由和对方分道扬镳，从而形成两派对峙的格局。红卫兵成都部队是成都高校造反派的统一组织，川大八二六本是其中之一员，当时的红成总部第一把手是由实力弱小的中医学院的造反派领袖担任。扶弱往往是为了抑强，那很可能是几个较强的学校彼此不买帐，又唯恐某一强者占了主导，显得自己落了下风，于是干脆把第一号位置让给了平庸之辈。在11·13大会上八二六宣布造红成总部的反，我对11·13大会的内幕不知情。事后想来，我疑心八二六造反的深层动机是他们自以为是大西南高校之首，因而对自己在红成中的地位不突出（说不定有时还受排挤）早就心怀不满。我还疑心像八二六这类造反派中的激进派未必都是因为激进才分裂，恐怕有不少倒是因为要分裂才变得激进——分裂总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嘛。整个文革的气氛是宁左勿右，所以分裂出来的一派大多都以更激进的面目出现。当然，一旦你扮演了激进的角色，以后的戏就得接着唱下去，到头来连你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激进而分裂呢，还是因分裂而激进。

纵观造反派内战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保守派势力较大的时候，造反派的内战——如果发生了内战的话——相对不激烈，造反派显得比较团结。在保守派衰败之后，造反派的团结就会破裂，内战就会爆发，就会升级加温。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上述现象很难得到解释。按照当时的理论，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路线斗争不可调和，所以两派必定要斗，而且必定斗得十分激烈。造反派之间的分歧是大方向一致之下的分歧，所以彼此不该斗，就算斗了也不该斗得那么凶狠。用社会冲突论来解释造反派内战也有同样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文革理解为比赛革命的革命，那么，上述现象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了。大敌当前，造反派需要和保守派一争高下，其内部矛盾便隐而不显。一旦老对手被打垮，造反派的内部矛盾就尖锐化、公开化。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实际上是争夺优势，争当核心，实际上是比赛谁个更正确，谁个更革命。这种竞争比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竞争更不容易解决。当造反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时，中央可以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批评保守派，这就等于宣判了斗争的胜负结果。可是，面对着两支造反派队伍，中央很难只支持一派不支持另一派，中央很难给出胜负的判决，而造反派们又没有一种公认的决定胜负的竞争程序。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两党竞争是通过周期性的选民投票来裁决胜负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却并没有采纳这种程序，因此，造反派的内战势必旷日持久。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是讲的“应然”，“实然”的情况则往往是“冤家易结不易解”。内战的时间愈长，两派间积累的矛盾和敌意便愈深，故而其争斗也就愈演愈烈。

从一开始，我就不大相信造反派打内战是所谓走资派操纵或坏人捣乱破坏的结果。那时我以为主要是造反派自身的问题。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参加了川大八二六总团的一场会议，听头头们讲话，讲来讲去都是在讲和红成打派仗的事。一个头头还颇有心得地说，要在政治上得分，就要善于引诱对方犯错误。这话让我很反感。我发现在一派内部，越是派性强越是受欢迎。多数人对大联合都缺乏诚意，起码是缺乏热情。他们更关心的是压倒对立派，是“以我为核心”。所以，我很赞成报上说的要克服无政府主义，克服派性，要斗私批修，多作自我批评的主张。

群众组织内战不休，毛泽东开出的药方是：斗私批修，各派多作自我批评，少讲对方的错误。毛还批评了“以我为核心”的思想，指出核心不是自封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这些道理看上去全对，没有人表示不赞成，可惜就是不灵验。

现在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像这样，把政治问题都归结为道德问题、思想问题，试图以道德说教或曰思想教育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所以效果不彰。毛泽东号召大家斗私，可是，有哪派群众组织肯承认自己争权力、争地位是出于私心呢？不论是出于偏执狂热，还是出于把私欲合理化，一般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对革命的追求和对原则的坚持。他们可以在个人的问题上承认有私心，作自我批评，但一涉及自己所属的组织 and 派别，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其实，群众组织这么做，正是跟共产党学的。共产党一向提倡自我批评，并将之列为自己的优良传统。但与此同时，共产党又自吹自擂，自己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群众有样学样，各派都毫不吝惜地、大言不惭地把种种称颂之词加在自己的头上。即便在非认错不可的时候，不少人也学会了文过饰非的本事。中央首长点名批评了某派群众，这派人就会刷出大标语：“中央首长讲话是对我某某战士的最大关心最大爱护！”“我某某战士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那言外之意是，别看我们挨了批评，那正说明我们更受中央器重哩。有的自我批评更是明抑暗扬，例如，有的八二六派公开承认自己这派对内斗有责任，因为“我们对犯了严重错误的红成战士帮助不够，教育不够”。这种自我批评能否促进两派联合，其效果不问也知。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承认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之间为争夺声望而互相竞争是自然的、正常的，那么，要求他们多批评自己少批评对方未免就有些强人所难了。那不成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吗？所谓“自我批评有助于提高威信”一说，我那时很赞同，后来发现也不尽然。首先，把自我批评和提高威信联系起来考虑，本身就承认了一般人在决定要不要自我批评时常常要考虑到威信的增损。正如像我们平时教育小孩子说，讲真话不会吃亏，到头来他们就可能根据会不会吃亏来决定要不要讲真话。如果大家都犯了相同的过错，谁先认错谁可能比较有利。但政治组织间打内战，常常是你方攻击我方在这件事上错了，我方攻击你方在那件事上错了。如果我方承认我方的确在这件事上错了，而你方却并不承认你方在那件事上错了，同时我方又放弃了对你方的揭露批评，我方就会担心群众造成错觉，以为你方一直是对的而只有我方犯过错。这就对我方不利了。或许有人会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话也对也不对。如果群众的眼睛从来就是雪亮的，永远都是雪亮的，天下早就太平无事了。我们相信群众有辨别力，那实际上是说，真相越讲越清，真理越辩越明。这正是要求我们不应放弃争辩，包括不应放弃对对手的批评和为自己进行申辩。照理说，在坚持实事求是地批评对手的同时，开展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也是应该的和有益的，是会受到群众欢迎的。不过，身处争斗漩涡中的人往往有不同的感觉，他们认为群众是很感性的，是容易被外在的气势所影响的，所以在政治斗争中不可太谦虚自抑，要尽量做出一贯正确、自信满满的样子，所以他们不大会接受要多做自我批评的劝告。

“斗私”这条不灵，“批修”这条也不灵。批修的意思是要群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这样，彼此间的敌意就淡了，相互间的同志之感就强了，内战就打不起来了，实现联合就容易了。简言之，批修的要旨是力图把群众关心的热点从内战转移到外战。理论上，大家都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但在实际上，多数人还是对内战兴趣更大。这也难怪，现阶段和前阶段不一样。在前阶段，各派组织还热衷于在对敌斗争中互相比试。你揪出一个大人物，我揪出一个更大的人物，你提“炮轰火烧”，我干脆提“打倒”，如此等等。如今，“共同敌人”——如刘少奇、李井泉等被中央定性或半定性，同意打倒靠边或默许打倒靠边的那些人——差不多都成了“死老虎”、“落水狗”，处于只能挨批斗而不能还手的境地，再接着打就没劲了，而且也显不出能耐显不出高明。更何况，打内战者并不承认自己是在打内战，他们总是把眼下的斗争称作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事实上这中间

也说不上有什么确定的标准。在成都地区，八二六和红成围绕着刘结挺、张西挺这两个干部该打还是该保的问题打了十个月的内战。最后中央宣布，打倒刘张就是搞右倾翻案。八二六遂成为反击右倾翻案的功臣，先前这段内战好像也就不算是内战了。

造反派打内战，辩论是手段之一。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两派选出能言善辩者同台辩论，唇枪舌剑，双方的笔杆子也写了不少文章互相辩驳；后来内战升级，两派坐不到一块儿了，辩论主要就成了打笔仗，隔空叫阵。一个普遍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心辩论和认真思考的人越来越少。另外，越到后来，双方的文章也越少讲道理，越多攻击性。八二六和红成争辩了十个月，但双方营垒中改变观点的人却为数极少。这就是说，大多数人在最初确定了自己的观点后就顽固地拒绝改变，任你对方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这也是造反派打内战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两派内战造成了广泛的辩论之风。那时，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碰到一起，动辄就问对方是哪一派观点的，若是观点不同，每每当下就争辩起来。都说中国人搞政治把家族观念、地域观念看得太重，不过在文革中这种情况却很少见。几乎每个地方的群众都分成两派，每一派的人都可以在其他地区找到自己的同志或盟友。一家人中间，兄弟姐妹之间乃至夫妻之间也常常分成两派。毛泽东说伍修权家四个孩子就分成两派。当时有句话，叫“亲不亲，线上分”，观点相同者，即使素不相识也容易一见如故，好像真有“同是中华革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味道。观点对立者，亲友间也可能搞得很不愉快。据说，在那些两派内斗火爆之处，两口子都有为此闹分居闹离婚的。文革中，意识形态的力量空前强大。它抹煞了、压制了其他种种区别，包括民族的区别、地域的区别、宗族的区别、亲情的区别。它使得政治观点的区别成为吞没一切的区别。如果说在运动初期，政治区别还常常体现为个人身分背景的区别的话，那么到现在，则体现为观点的区别、路线的区别。对广大群众而言，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你是什么人”，而是“你是什么观点”，“你站在哪一边”。

在新形势下，群众有了选择政治观点、从而也就是选择派别归属的空间。这就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刺激了群众的参与热情。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时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就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这其实就是指群众大量地卷入了派别之争。不过依我之见，我们也不可夸大一般人在选择派别时的理性成分和自觉性。事实上，许多人在选择加入这一派造反派或那一派造反派时倒是很偶然的，很不经意的，因为先前很少有人预料到造反派会发生大分裂，会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分裂和对立会发展到势同水火的地步。我所在的成都十九中和四川大学比邻，故尔十九中的造反派从一开始便和川大八二六关系较密切，常常参加由八二六组织的活动，于是就成了八二六派。当初，大学生们下厂下乡下基层下外地煽风点火扎根串联，扶持和帮助了当地的造反派组织，后来大学生分成两派打内战，那些组织便分别依着与他们的亲疏关系而成了这一派或成了那一派。换言之，许多组织与其说是在两派内战中选择了自己的观点从而选择了自己的派别归属，不如说是依着原先的关系亲疏而无意中预先就确定了自己的派别归属，然后再按照自己的派别归属而照单收下了该派后来提出的观点。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许多单位，保守派瓦解后，部分保守派成员改换门庭加入造反派。这些保守派在选择新的派别归属时，常常不是出于观点的考虑，而是出于和本单位老造反派的对立情绪：你要是八二六，我就当红成；你要是红成，我就当八二六。

虽然许多组织、许多个人之成为某派的成员有其偶然性或随机性，但是，一旦他们以某派自居，他们就有了和某派荣辱与共的强烈感觉，他们就会把本派的胜利视为自己的胜利，把本派的挫折视为自己的挫折。当两派围绕着不同的观点展开争辩时，尽管那些观点只不过是本派的头头们提出来的，或者是本派的其他一部分成员提出来的，事先并未征求过他们的同意，他们对那些观点也许根本不曾思考过，可是，他们却不假思索地就把这些观点当成了

自己的观点，顽固地为之坚持，热烈地为之辩护（当然，两派打内战提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从维护本派利益出发，所以本派的人也容易听得进去）。如果他们辩不过对方，那通常并不会刺激他们虚心反省，反倒更加固执己见。由于大多数人从派性出发，不抱有服从真理、择善而从的态度，所以这种辩论不会产生多少积极的成果。到后来，多数人干脆拒绝再听取对方的意见。那时，两派都办了不少报纸，可是它们的读者往往只是本派的群众，很少有人还读对立派的报纸。人们读报，主要目的不在于全面了解事实，弄清双方道理，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强化自己既定的立场，因此它不是促成联合，而是加深分裂。通常人们都认为，在政治辩论中很难达成共识，那是因为双方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没有共同语言。造反派打内战则不然。照理说，既然造反派的兩派都信奉同一套理论和同一个权威，采用同一套语言概念和价值标准，因此双方本来是应该比较容易获得共识的，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

从一开始，我就对造反派闹分裂、打内战很不赞同。我主张两派求同存异，主张大联合，主张和对立派理性辩论。我找到了不少同志，有本派的，也有对立派的，有本校的，也有外校外单位的。但令人困惑的是，采取我们这种态度的人并不多。有些人在不公开的小圈子的讨论中，表现得很开放、很通情达理，但一到公开的大场合却又表现得很派性，唯恐被别人视为立场不坚定。作为一派的成员，我们无不感到一种同派的压力，派性的压力。那时，两派中都有一批自称“钢杆”、“铁杆”的成员，他们热烈地、不问青红皂白地拥护本派的一切，并且以此为荣。有的尤其走极端，他们不仅自己对另一派采取绝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而且还要求本派的其他人也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否则就斥为“右倾投降”。“钢杆”、“铁杆”们的危险主要还不在于其立场的强硬，而在于他们对理性讨论的厌恶与敌视。这也难怪，因为真正的讨论都具有开放性，这就让那些不问青红皂白拥护本派观点的人感到是一种威胁，故而引起他们的反感。这种人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在组织内部一向很少有人正面抵制，所以显得颇有气势。连那些总部的头头们也对他们忌憚三分。有时开大会，强硬派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于让我担心，在这种场合下，若有哪位头头提出太温和的主张，只怕也会被轰下台的。我不禁想，头头们的强硬大概也是让底下的群众逼出来的吧；但反过来想，底下群众的强硬不也常常是让头头们逼出来的吗？应该说，在每一派内部都存在着一一种天然的趋势，把整个组织朝极端的方向推进。只有在民主制下，为了争取中间选民以至争取对立派选民，各派才会克服自身的极端化倾向；而这种机制恰恰是文革所不具有的。

不言而喻，两派内部的强硬倾向都是不喜欢联合的。当我们一批温和派走到一起积极呼吁联合时，立刻招致他们的反对。他们给我们扣上“第三势力”的帽子。这个称谓在当时带有贬义。过去国共内战，一批民主人士出面调停，被称为第三种力量，其主张被称为第三条道路。这件事在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受到批评的。所谓“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一向是被视作虚伪，视作“貌似公正”，并大有“出卖原则”的嫌疑。另外，称你是第三势力还带有这样一种明示或暗示，那就是把你打成争权夺利的又一方。好比两人打架，你本是来劝架的，但这两人却一起把你当作新加入的打架的。尽管有着最高指示和报上社论作后盾，联合的主张堂堂正正，我们的声音还是显得很弱小，我们这些人在自己一派之内还是或多或少的受排挤。

文革中，一个堪称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空前的强大，轻轻发下一句话就足以宣布一个“大人物”的政治死刑。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又空前的无能，譬如说，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下面的群众似乎都置若罔闻，阳奉阴违。听说有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发现在他乘坐的专车上的乘务人员分为两派。毛亲自出面劝说他们实行联合。在很费了一番唇舌后（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两派代表终于宣布联合成功。谁知毛一下车，这个联合就泡汤了。

前面提到，成都地区造反派打内战，是围绕着刘结挺、张西挺这两个干部该打还是该保进行的。两大派就联合问题举行谈判，八二六派坚持要把“拥护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和张西挺为首的省革筹”写进联合公告，红成派则拒绝，红成派坚持只写“拥护省革筹”，或者写“拥护省革筹的正确领导”（言外之意是不正确的领导就不拥护）。我们这些力主大联合的人则认为两派可以求同存异，因此联合公告只写“拥护省革筹”就可以了，不必提及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的名字。我们的这种主张红成派乐得赞同，八二六派坚决反对，说我们是“出卖原则”、“拿原则做交易”。于是乎，大联合的谈判破裂，内战接着打下去，愈演愈烈。直到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中央首长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川地区群众组织代表，直接表态：打倒刘张是错误的，打倒刘张就是替李井泉（此前中央文件已宣布李井泉是四川地区最大走资派）翻案。红成派只好认错认输。先前我讲过，造反派打内战，实际上是争夺优势，争当核心，实际上是比谁个更正确、谁个更革命。如今，中央已经做出裁决，内战就消停了，接下来，两大派的联合也就完成了。不过，像四川这样，由中央直接表态做出裁决的情形并不多。对于大部分地区的造反派内战，中央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两派相持不下，内战便总是停不下来。直到1968年7月底，毛泽东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两大派之上来了个有更高权威的“婆婆”，旷日持久的内战终于告停。

如何解释造反派打内战？有人把它归结为意识形态狂热，归结为某种理想主义。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那些显而易见的不符合当年那套意识形态或理想主义的行为。例如，毛泽东一再号召大联合，为什么下面的群众偏偏不听从？另外有人则强调对利益的争夺，指出在激烈的革命口号下暗含的利益争夺。可是这种观点又无法解释那些明显的违背自身利益的种种革命行动。所以，我把它解释为比赛革命的革命，解释为争取承认的斗争。

正如阿伦特所说：“作为人的人，即每一表现出自己特性的个体在行动和言语中展现和证实自己，这些活动（不管其题材有用无用）具备自身的一种持久品质，因为它们创造了值得记忆的东西。”柯杰夫说得对：只有人才可能会追求“从生物学观点来看是完全无用的东西，如奖牌、锦标等”。人追求这些，并不一定在于它本身具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别人也同样追求。人要作为人而存在，就必须获得他人的承认，尤其是希望被承认为一个具有某种价值和尊严的存在者。为了赢得这种承认，他甘愿做赔本生意，甚至甘愿冒着风险，克服其动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象的目标。简而言之，人希望实现自己，展现自己，从而被别人承认，被别人认识和记住。所谓公共空间，就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们在这一世界中为展现自我所需的空间”（阿伦特语）。正常状态下的极权社会无疑是一个壁垒森严、僵硬死板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现自我和发挥创造力的正当机会。人们的进取心和表现欲一概被严格地限制在当局所规定的既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文革的爆发，意味着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舞台或曰公共空间。固然，这个公共空间不过是如来佛的手板心，你不可以跳到手板心以外去，因此是个冒牌货，是个替代品，但它毕竟具有公共空间的若干特性，给人们以某种展现自己和证实自己的机会，更由于当年的孙悟空们本领不大，一时间感觉不到这手板心是什么限制，于是在里面跳得很起劲很投入。

在当年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是革命，革命简直是一种宗教。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被视为唯一正确的人生目标。举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独立的价值，唯有从属于至高无上的革命才有意义。起码是在理论上，大家都承认，革命是一个人们应当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而被革命所排拒，甚至被认作反革命，那就比单纯的肉体死亡还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也是人生的唯一归属。在一个高度革命化的、由所谓革命者掌控了全部资源的社会，革命和个人物质利益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本来，革命是贬低个人物质利益的，革命要求你“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革命具有克制个人物质欲望的斯巴达式的外貌，因此，革命具有吸引理想主义者的强大魅力。但与此同时，既然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资源，既然

革命被确立为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准，因此这种社会又不可避免地会依据人们的革命程度而安排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它势必要按照人们的革命程度给予奖赏和惩罚；因此，革命又常常是（但并不必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则必定是受剥夺的，是吃亏倒霉的。这就迫使那些本来不追求革命的人也不得尽量做出要革命的样子。于是到头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革命追求有多真诚或多不真诚，你都会卷入到比赛革命的革命中去。而正像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言：政治就像踢足球，流行的战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期望的那些，而是球员发现能赖以取胜的那些，而人们隐约感到，那些最可能使自己获得胜利的手段和那些最能够把国家治理好的办法常常不是一回事。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也许能更好地解释文革中造反派内战，以及整个文革。

□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  
【人物春秋】

张春桥其人

• 李海文 •

《张春桥狱中家书》在香港面世以后，有人被张对女儿、后代的爱而感动，认为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充满了爱心。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当看到社会中的不公，误以为再发动一次文革就可以解决问题，称赞张春桥以文革思想逻辑对时政的评说，甚至集会纪念张，为他招魂。如何认识张春桥，再度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一篇文章，不可能说尽张春桥的方方面面。本文只想选取与其家庭和经历相关的视角，来透视张春桥到底是一个高蹈理想的殉道者，还是一个充满心机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谆谆长者，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弄权政客？

—

上海1967年1月，1968年4月两次发生“炮打张春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张春桥妻子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文静生于1916年，原名李淑芳、笔名李若文，比张春桥大一岁。1933年加入共青团，后失去组织关系。1942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在党校学习后于1943年春分配至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当时张春桥也在此任干事。两人相识、相恋。当年12月8日在日军扫荡中文静被俘，经不起酷刑，半年后投敌、叛变，编入日军“宣传班”任班长，编写《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弃暗投明》《玩火自焚》等文章和节目，鼓吹“中日亲善”，并亲自讲演、演出。还参加日军的“反共同盟”，与日军中西少尉一起秘密外出散发反共传单，策反劝降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干部。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芳无处可藏，来到晋察冀投奔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他收留了李淑芳，给她改名为文静。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9月初，张春桥随报社一起进入张家口，此时编辑部恢复部长制，张任部长，将文静安排在编辑部资料科任编辑。因为李淑芳被俘、叛变在晋察冀不是秘密，很多干部都知道。但是，知道昔日的李淑芳就是今天的文静的人相对少一些。1945年12月15日他在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制履历表》时，对爱人文静加了一个小注：

已否结婚：未。爱人姓名：文静。是否党员：是（注二）  
他（她）过去负何职务：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干事  
现在何处负何职务：日报社资料科编辑



（注二）是1943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1943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

他有意不写文静何时、何地参加共产党，因为到党校学习的人并不都是党员。更不写文静叛变的事实，却含糊地写“她的组织问题”，“据称”“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

1947年9月21日，他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部调查表》时，仍然写道：

爱人的家庭情况：文静本人则是学生，17岁开始参加C·Y（共青团的代称），中间失掉过关系。1942年来解放区，在分局党校学习，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1943年反扫荡被俘。19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复关系。

关于文静的历史问题，已由“被俘”增加了“逃出”。

文静的历史污点仍是张春桥的心病，在张的努力下，夫妻俩终于离开了晋察冀干部集中的华北，到了上海。1949年5月，张春桥刚到上海立足未稳，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表》时写道：

“文静（李若文）现在石家庄日报任编辑，是党员，曾被俘，尚未恢复关系。”

张春桥到上海之前任石家庄日报社长，安排文静任石家庄日报任编辑并不困难。此时文静由“李淑芳”改为“李若文”，政治身份已经被他明确为“是党员”了。

1959年张春桥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写道：文静：党员，上海新华社记者。

1950年6月起，张春桥任新华通讯社华东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分社曾经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打报告提升文静为副社长，宣传部长杨西光将报告转到上海市委，但是没有被批准。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曾在晋察冀工作，担任过石家庄市长，是张春桥的老领导。文静的历史问题让上海市委、华东局更多的干部知道了。1959年1月张春桥进入上海市委常委，不久将文静从新华社分社调到市委办公厅，避免出头露面，又通过做调研、编简报掌握全局情况。

文革中捉叛徒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文静坐卧不安。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要长住北京，临走前对文静说：“你还（是）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给文静吃了一颗定心丸。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张春桥任革委会主任。1971年上海市委成立，张春桥任第一书记。一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张在上海当了10年的第一把手。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改为调查研究组）工作，管过专案，抓过全市动态。她虽然没有职务，却是实际负责人，享受着相当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甚至连有的不发给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文件，由徐景贤提出，张春桥同意，也发给她。文静在康平路市委大院盛气凌人，马天水、徐景贤有事都要同她商量。

九大以后开展整党运动，其中一项内容是把有确凿证据的叛徒、特务清除出党。文静惴惴不安。张春桥要她请假休息，不参加运动。表面上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称病在家。实际上秉承张的旨意，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照旧将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文静仍然过问联络组的工作，经常把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找到家里出谋划策。王洪文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时期，也常常到文静家里去，商量事宜。黄涛、朱永嘉、何秀文等人为了讨好张春桥，常常把自己起草、经张春桥批示的发言稿送给文静，请她“审阅”、“指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4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来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才停发文静的文件。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等人的主要攻击对象。由于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张春桥过关了，但他知道今后还有风险。9月28日，他给文静写信说了些一语双关的话：

如果发生问题，一切从简，不要惊动什么人。弟弟们可以通知一声，但是，要他们不要到上海来，此事，应由佩英（注：张的妹妹）通知。

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垮台。1972年底，张回上海在兴国饭店和文静生活在一起，做了安排。

1973年十大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再次出手。在九大前后，周恩来曾三次写报告要求审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在当时是唯一能打击或停止张工作的正当理由。但是他的报告石沉大海。所以张春桥敢明白地告诉文静：“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文静的历史问题）打倒我。”

周恩来另辟蹊径，1973年9月陪法国总统访问上海，邓颖超同行。晚上到康平路市委领导的家串门，但是独独不进文静的家门。这个动作吓得文静心脏病发作，住了医院。

消息迅速传到北京，张春桥决定与文静离婚，托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转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离婚的决定。王洪文说：“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要考虑到影响。”从此张春桥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文静也从未到过北京。但是，孩子们可以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张春桥通过孩子们和文静保持来往。1976年10月当王秀珍电话找不到张春桥时，10月8日一大早向文静打听消息。可见，文静与张春桥的联系之密切。

文静不搬出康平路，明着说是对孩子们好。其实，张春桥是怕文静搬出去，落到别人手中对他不利。1969年2月，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去世。姚蓬子是叛徒，又当过国民党特务，如何安置姚文元的母亲成了难题。张春桥亲自找姚文元妻子金英谈话，说：“还是把母亲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边，被人家揪住更不好。”张春桥对文静的爱护姚文元心知肚明。1975年6月，姚文元回上海，王秀珍又问起“离婚”这件事，姚说：“文静的历史不成问题了。”同年8、9月间，王洪文在中央受到批评回到上海，还单独宴请文静。

1976年5月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镇压下去后，张春桥给徐景贤写信要徐为他在上海找个“伴”。经过寻找、物色，10月6日徐景贤将一位女士的资料发到北京。人算不如天算，这天晚上张春桥被隔离审查。

张春桥的另一个心病是自己的党籍问题。1967年5月，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的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师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在外调“七二一”大学党委书记时发现张春桥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宋振鼎亲自介绍张春桥参加。宋振鼎（化名吴成志）与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4、5月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发展了张春桥。后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同宋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立即解散。当然也就不承认这个组织任何成员的党籍，也包括吴仲超没有见过的张春桥。

这个组织是哪年成立的？张春桥认为是1936年成立的。1950年10月，他在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时写道：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

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2月转正。

1955年审干时，宋说此组织是1937年4、5月间成立。组织又去找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吴仲超回忆：“我于1936年2月出狱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厅长）认识，当时都在找党的关系，我到1936年下半年经张执一才与党取得联系……”

张春桥看到吴仲超的证明不得不改口承认是1937年的4、5月间。在中国共产党内，1937年7月7日之前入党的是内战时期干部，之后入党的是抗战时期干部。1937年张春桥只有20岁，为了追求进步，参加了一个上级共产党不承认的党组织，并不是严重问题。但建国后审干认定张是1938年8月加入共产党。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早在1938年1月，张春桥从济南到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就四处奔走，找到原来在上海工作过的同志，找到原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时任陕北公学专职教师周扬。然而，他们因在上海不认识张春桥而无法做证。所以张春桥一直没有解决组织问题。他弟弟张秋桥在当年3月入党，到了山东分局。这样张春桥才不得不于1938年8月入党。建国后张仍然坚持自己是内战的干部，把入党时间定在1937年4、5月间。他一方面主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为延伸自己的革命资历颇费心思。晚年给女儿写信，仍然要在自己的资历上添油加醋。

在1992年12月29日的信中回忆他与毛主席第一次谈话说：“1939年初，我在陕北公学当宣传科长，他到学校做报告，事先向我调查学生的思想情况。谈了些什么，一点也不记得。当时他写了一些字，这张题词，我带到敌后，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

当时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1928年入党，从德文直译《共产党宣言》，1934年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是党内有名的翻译家、理论家。副校长、党委书记是李维汉，1922年入党，1925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于1937年9月1日开始上课，到10月学员已经有五个队，共约600人。学员不仅有小学生、也有像张春桥这样的初中毕业生，还有大学生、留学生。学期一般是3个月。11月1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学校设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政治部）、总支委。学员分为队、分队、班。队相当于连，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

位，每队约100到120人，由队长、指导员、助理员、副队长、队学生分会主任等组成队的领导小组，负责全队的工作。班是学习单位，每班有8—10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编班。班长、副班长由学员选举产生。当时的队长、指导员都是由长征干部或内战时期的干部担任，副队长以下的干部由学员选举。

张春桥只是一般学员，留校也只是干事而已。

查阅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1938年4月中央决定在陕西旬邑县看花宫成立陕北公学分校，由李维汉任分校校长率大部学员于5月30日离开延安迁到旬邑县看花宫。成仿吾留总校主持工作。政治部宣传科长是申光。

李维汉回忆是从1979年开始，由他口述史实，并提供调查线索，然后由协助整理的同志根据他谈话的基本内容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并向知情人采访整理成文，再由李维汉亲自审阅，反复修改。1986年1月出版。帮助整理抗日战争时期的有王淇、吴良珂、宋金寿等8人。王淇曾是解放战争参加共产党，人民大学党史系的教师，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室委，现年90岁。陕公办了不到4年时间，培养了11000多名学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陕公学习过的学员大都是六七十岁，活跃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所以李维汉回忆申光是宣传科长，不仅是他个人回忆的孤证，也是王淇等同志调查的结果。

文革前张春桥在干部登记表中填的是：校刊编委会宣传部长。这是一个群众自治组织职务，不是行政职务。1939年12月，张春桥担任的是华北联合大学宣传科长。这年7月陕公和鲁艺、安吴堡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离开陕北到了敌后晋察冀边区。

毛泽东很关心陕北公学的工作，多次到学校做报告，并题词。张春桥在延安时也听过毛泽东的报告。他和毛泽东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更不会得到题词。所以他在信中说“谈了些什么，一点也不记得”。至于那张题词，他说：“我带到敌后，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张春桥为了维护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不惜编造历史。

### 三

按照共产党的审干标准，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入党时间有疑点，但并不是假党员。文革是一个斗争哲学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些都成了张春桥格外忌讳的政治软肋。为了回护这些软肋，张春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968年4月，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4月12日，市革委会组织组有两个人看了文静的档案，同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的历史的话。张春桥大为恼火，在他的指使下，由徐景贤到组织组取走了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在市革委会档案室。同时，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组了市委组织组，把那两个人调离，设专案折磨8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师大近2000人举行反对张春桥的示威游行，然后调查张春桥、姚蓬子的历史，整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过去写的文章。张春桥把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大多数负责人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4日，对2500名师生搜查、抄家，不仅翻箱倒柜，还捅破天花板，掘地3尺，折腾了13个小时。同时派记者现场采访，派专人验收，结果一无所获。张春桥大失所望，训斥：“对政治材料不够重视”，要好好“吸取这个教训”。他很快领悟到材料都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要毁掉这批材料，必须整垮、整死这批同志。1970年11月，张春桥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反对

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椎子”，“动刀子”。并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什么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这次该杀的就要杀”。在他的指使下，制造“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将大批群众干部抓起来，两幢教工宿舍改为监狱一样的隔离室。重点人员关进潮湿阴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准治疗。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离室装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书，播放这些被关人员亲属的泣不成声的讲话录音，将人逼疯、跳楼，身亡后，被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1967年5月在外调时发现张春桥于1936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他们认为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中央文革工作会对党造成巨大的危害，7月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分别上报党中央、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在附件列出参加这个组织的名单，其中就有张春桥。于是他们被扣上“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窃取国家机密”等罪名。1967年底张春桥批示：“怎么坏人揪坏人？”于是他们成为坏人。从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风，每次运动都要把他们大整一通，一次比一次厉害，持续8年之久。

公安局曾成立一个30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张春桥怕查到自己头上，下令把这个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和材料全部并入市革委会专案组，由他和王少庸控制。半年后以“旧公安人员不可靠”，全部赶出专案组。一个人曾接待过交通部外调人员，按规定为他们转了一封介绍信。因外调接触到江青1934年被捕情况。王少庸下令将材料追回，将交通部的两名外调人员及这位公安和他一起工作的两位公安统统抓起来，打成五一六分子。解放初期，公安局接管一批敌伪档案和30年代的报刊。江青说公安局有她的“特别档案”。张春桥立即指使当时负责公检法的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集中1000人，到公安局翻箱倒柜，“清理档案”拿走涉及江青的资料50余册，查封30年代的书刊15000册，拿走张春桥、张春桥父亲、姚蓬子材料一大批。张春桥说：“看档案要有控制”，“敌伪档案不一定可靠”，“登报的不一定是叛徒”。张春桥以“防扩散”为名，下令凡涉及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一不准外传，二不准扩散，三不准登记，四不准办签发手续。以“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的罪名，将档案处两名处长、两名干部押送到北京长期关押，将处长王学纯折磨得下肢瘫痪，有病不让治。在场的医护人员看不下去，提出抗议。他们竟然将人抬出病房，把她拖进冰冷的房间，连续数小时逼供。将王学纯迫害致死。

张春桥直接指使王维国捏造了17件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两位书记和97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一个处250多人，有137人以“侦察控制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被关押，51人打成反革命。1969年初，张春桥说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对他们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鼓吹“打人是觉悟高的表现”，“假的要当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样一串一串摘”。在公安系统大搞白色恐怖，刑讯逼供，大搞“疲劳战”、“车轮战”、“火线学习班”、“大兵团作战”、“夜开花”、“开刀间”，用冷水浇，热水烫，反绑吊打，直到木棍打断，铜条打弯，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烧胡子眉毛”、“抽筋”、“剥皮”、“坐地老虎凳”、“假枪毙”等三四十种法西斯式的刑罚。市公安局院内拷打声、惨叫声不断，周围居民都听不下去。

整人手段如此残忍，令人不寒而栗。

张春桥的家书会让人误认为他仅是舞文弄墨的文人，热衷于思想理论，其实，他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和血腥。限于篇幅，我仅举胡永年一个例子。

文革初期，上海足球队队员胡永年造反，被张春桥看中。1967年1月，全市掀起第一次反张春桥的高潮，张春桥指使胡永年四处镇压。胡永年调动人马，把在南京路刷反对张春桥大字报的红卫兵强行拖入体委大楼，进行围攻、辱骂，并拍下照片，用武力威胁他们将大字报撕下来。张春桥吹捧胡永年为：“我们的胡司令！”“我们的大炮！”1967年6月，市体委革委会成立时，张春桥亲自将原上报担任革委会主任的人拿掉，让胡永年担任上海体育革委会的主任，后来张春桥点名让胡担任市革委会委员、市文教组核心成员、市保卫组副组长，亲自委托他抓上海的“社会治安”，甚至将胡评为全市先进个人。1968年4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时，投桃报李，胡永年立即到体委的基层单位拍着胸脯叫喊：“张春桥我就是死保，保定了。”他带人看地形，策划武斗方案。

1967年至1968年，胡永年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在社会上到处插手，挑动武斗，大搞打砸抢。他把工人群众成批地捉进体委大楼，强迫他们脱去鞋袜，跪在地上，或绑在长凳、乒乓台上，胡永年带头用鞭子抽，木棍、铁棒毒打，用大刀的刀背砍劈，甚至放狼狗咬，将人打死。1968年1月胡永年召开体委系统大会，在会上，他说：“气氛不够”，带头毒打干部，许多没有任何问题的干部，有的被打成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口腔破裂，牙齿掉了几个，有的当场大腿被打断，有的被打倒，还跳上背部继续用脚踩，还不能看病，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之后，体委系统打人更加肆无忌惮。他经常说这个单位的当权派不老实，要“清醒清醒”。胡永年召开现场会，他督战、动手对一名干部审讯，一边打耳光，一边要他回答问题，让他举起两手，稍微垂下来，胡永年就用烟头烫，用大头针扎。从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折磨了十几个小时。在他的现场示范后，体委系统的逼供信更加猖獗。

1969年春节体委系统揭露、批判胡永年的罪恶行径，张春桥、王洪文立即通过马、徐、王派人将这场斗争压下去。后来在“一打三反”中群众再次揭露胡永年的罪行，王秀珍却说：“上海的几个司令，胡永年还是比较好的，不要搞了吧！”再次包庇下来。

1974年毛泽东指示解放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并分配工作。张春桥极力阻止，同时下令要给一批因表现不好而被群众反下去的老造反派“落实政策”。马、徐、王按照张春桥旨意让胡永年当体委副主任，重新提上来。

张春桥授意要把胡永年拉入党内，对他的严重问题，采取“不要内查外调，不要接触本人，从现有材料中找出结论”的办法。这件事由于遭到体委系统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1975年徐景贤找胡永年密谈，当面给党票，说：“祝你早日入党”。王秀珍向胡交底：“你们这些人的组织问题，要通过在中央工作的上海领导，你们可不要着急呀。”

以上所举，不过是张春桥在台上期间的几个侧面而已。就这也足以看到他的人格并非表里如一，施政更无人性可言。后人读书，切不要被他的书信集中营造的家庭温情、“革命理念”一叶障目，而忽视张春桥真实、丑陋、残酷、血腥的一面。

□ 原载《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

~~~~~

【百家争鸣】

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读《王大宾回忆录》

• 东 夫 •

我一直认为造反派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读了香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的《王大宾的回忆录》，更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一)

经过多年的蓄意涂抹歪曲，文革这一页刚刚翻过的历史，已成功搅合成一锅浆糊，连许多过来人都被忽悠得找不着北，更别说后来人了。所以在谈这个话题前，先要对本文所说的“造反派”做个定义（百度“造反派”是不成的，不信试试）。概略说吧，文革中所有群众组织虽然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拨人。一拨人造的是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敌对分之的反，斗争矛头向下；一拨人造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斗争矛头向上。前者实际上谈不上“造反”，所以被骂成“保皇派”、“保爹保妈派”、“保守势力”等等；后者才是真正的“犯上作乱”（当然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自诩“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本文所说的造反派属于后者。

因为犯上作乱，造反派被文革中受到打击的当权者恨之入骨，报复起来比造反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其作为胜利者重写历史，就把文革的灾难统统朝他们身上堆。于是如今人们心目中的造反派，就是影视剧里凶神恶煞、无恶不作的歹徒。至于造反派头头，当然是罪恶累累的大坏蛋了。

(二)

他们是那样的人吗？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王大宾这个名字的，他是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头头，文革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年是初中红卫兵的我，只有仰视的份。多年后经朋友彭伟引荐，竟然在他安身立命都江堰相识：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黝黑脸上刻满岁月的皱纹，朴实得近乎土气，完全没有呼风唤雨大人物的气派，更看不出丝毫恶魔的影子。

是不是挨了整坐了牢才“改造”成这样的呢？不是。王大宾从来就是一个好人。他本四川德昌县大山深处贫苦农家子弟，靠助学金一路走进北京的大学。大学里是团干部，中共预备党员，巴心巴肝爱党爱国爱领袖，一言一行谨遵不渝，标准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历经上天入地的大起大落，受尽不白之冤，坐牢九年出来还是本性难移。公职开除无以为生，香港的亲戚带电子表给他赚钱，他不愿“投机倒把”，居然偷偷摸摸原价出售。有人想办法安全送他到香港，他认为属于“偷渡”，说宁可回家种地，也不干这种“给千千万万红卫兵脸上抹黑”的事。他从无到有一手一脚把一个乡镇小厂办到全行业知名，自己成了行业全国理事，却不拿一分钱奖金。外商给他投资办合资企业，他怕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拒不接受，乃至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学、都江堰市领导多方劝导他才想通……。如此等等，傻得可爱。也正是如此，他才被许多不执政治偏见者认可，施以援手，从一个刑余无业人员，打拼成颇有成就的技术型企业家，挣得衣食无忧的晚年。

(三)

造反派是群众自发组织，自然鱼龙混杂，浑水摸鱼者有之、胡作非为者之，但主流却是王大宾这样的人。他们是一大批听领袖和党的话，极富革命激情、社会担当和献身精神的单纯、幼稚、偏激的时代产儿，尤其当头头的。他们的罪过不是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而是太过听信党和毛主席的话，听信到了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用时下的话就是脑残）的地步。试想

一批青少年学生，书读得好好的，求上进还来不及，哪里想到要“造反”。因为红太阳一挥手，党中央发号召，生怕当不了乖娃娃，就热血沸腾地干起来了。说他们是坏人，是谁教他们干坏事的？王大宾当年气壮如牛，不就是背后有大公主肖力（李纳）撑着么。正如当年坚持接收王大宾的灌县（现都江堰市）县委书记徐振汉所说：“他当时是个学生，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他当时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党中央的话，他听谁的话？”

话说回来，王大宾们造反，也是被逼出来的。文革初期刘邓用的是文革前整人的老一套，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打“黑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引蛇出洞抓右派。照这么搞下去，无非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反对工作组的王大宾在劫难逃。结果刘邓也没有料到这次主席的主意变了，他要运动群众清洗党内异己。于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驾轻就熟的整人套路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列入名单的右派突然就变成了左派。王大宾们拨云见日一飞冲天，云里雾里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追随大救星的革命斗志可以想见。不幸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会把船打到什么地方，连伟大舵手都弄不清楚，无法无天由着性子整烂再说。划船的小子们只有卖力的分，天知道他什么“战略部署”。看到船要打翻了找平衡，就把划船的抓来治罪，你说冤不冤？达到目的就兔死狗烹，把所有的灾祸都扣在他们头上，你说惨不惨？

（四）

文革惨遭文化浩劫，这是谁干的呢？通常说法就是造反派干的。其实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而是以高干子弟为首的早期红卫兵（以下简称老红卫兵）干的。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通过的文革《十六条》，进一步提出“破四旧”。当月老红卫兵发起“砸烂一切四旧”的行动，全国各地竞相效仿，迅速演变成一场毁坏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大扫荡，大量文化古迹惨遭破坏，大量民间文物珍藏毁于一旦。这一轮浩劫在中央文革提出批评后得到遏制，并随着斗争矛头转向打击“走资派”而不再大规模发生。也就是说，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主要发生在文革初期，实施者主要是后来被称为“保皇派”、“保爹保妈派”的老红卫兵。例如北京市文革中被毁的4992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1966年8到9月被毁的。而这时造反派还处于被压制的少数派地位，根本不成气候，与这一切基本不相干。

（五）

文革中整死人，是安在造反派头上的最大罪行。实际大谬不然。文革中死于非命者大多数并非造反派所为，反倒是造反派被整死得最多。

文革整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定数，比较靠谱的说法是200万左右。这些人是如何死的呢？学界比较认可的海外当代史学家丁抒教授的计算是：

- 一，1966年“红色恐怖”时期杀人约10万；
- 二，文革初期自杀者约20万；
- 三，武斗死30到50万；
- 四，“清队”死50万以上；
- 五，一打三反、清查516致死约50万；

记住，第一类“红色恐怖”时期死亡与造反派无关。“红色恐怖”1966年八九月间老红卫兵制造的暴行，他们在“破四旧”的同时，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大规模抄家，残

酷打杀，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北京市被抄家达11.4万余户，全国抄家上千万户。伴随抄家的，是拷打杀害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手段之凶残骇人听闻。北京市已公开的数字是打死1772人，未公开的统计打死万人以上。

记住，第二类死亡“文革初期自杀”与造反派无关。文革初期自杀潮，也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弃世者包括运动初期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及其之女、历次政治运动戴帽者、建国前工商业人士，知识文化精英等。著名者如老舍、邓拓、傅雷夫妇等，全国皆然。笔者所在的成都四中文革初期也有两位教师自杀，一个卧轨，一个上吊。

记住，武斗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武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残杀，死者都是文革的牺牲品。武斗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行为，和杀害手无寸铁和解除武装者性质不同，后者属于屠杀。而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是保守派所为，造反派是其中主要屠杀对象。如1967年七八月间的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人死于非命，就是城里失势退守农村的保守派与县、区、乡干部联手所为。

记住，“清队”整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清队”全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毛泽东为结束文革乱局发起的政治清洗运动，目标是所谓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同时进行“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合称“批清”运动。运动由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的军队干部领导，相当于又一次镇反运动，实际上是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大批人被整死和镇压。如四川在“清队”运动中就批斗、关押、判刑十多万人，仅成都市就涉及两万余人。（李亚丹：《李大章远去的背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记住，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整死的主要也是造反派。批清、清查5.16运动先后从1968年初持续到文革后期，整死百万人以上。如四川清查5.16运动高潮的1970年前8个月，全省共发生自杀3887起，死亡3331人。连“当过区供销社群众组织头头”都成为罪状。（同上注）。

总之记住，除了武斗，文革死人基本不能算在造反派头上，反倒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人死得最多。

（六）

那么整死老革命呢？造反派打击对象是当权者，这顶帽子似乎铁打的了。也不对。

其一，文革中领导干部几乎人人被批斗，但置干部于死地的，主要不是被造反派批斗关押，因为那不过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许多人是扛得住的。因为是人是鬼，还得“组织上”说了算。“士可杀不可辱”者固然有之，但更多是被“组织上”扣上反党黑帮、死不改悔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罪名而置之死地的。你能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许多老革命是造反派整死的吗？其二，十年浩劫中不断有干部被整死，而造反派大规模批斗干部只有一年多时间，很快就沦为打击对象退出政治舞台，这笔账怎么能都算在他们头上？其三，造反派打击了一批干部，也保护了一批干部。如王大宾领导的地院造反派，就让十多个省市的老干部到地质学院避难，因而受到周恩来、李先念表扬和拨款资助。而所有的派斗武斗，都是围绕保护或打到某个领导干部展开的，为此死于非命的造反派，比被害死的干部多了不知多少倍。

据叶剑英提出的数据，文革中有250万干部受到批斗关押，十一万五千五百余人在关押批斗中死亡。这个数字令人怀疑，因为他同时说文革害死了2000万人，显然不靠谱。假定他说的数字是真的，那么干部在死亡总数中只占0.58%，比干部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还低，可见其受害比老百姓小得多。

不幸的是，这些历史都被掩盖和篡改了，文艺作品更是竭尽栽赃之能是。例如因改编电视剧闻名的小说《亮剑》，描写李云龙文革中下令向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开枪，被打成镇压群众运动的侏子手开枪自尽，妻子田雨也割腕自杀，悲壮之极。其实小说中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原为北京军区中将副司令员，因爱上小姨妹坚决跟原配离婚，1964年被撤职开除党籍，沦为农场场长。文革中他写信向毛泽东承认错误获开恩，1970年复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与小说情节风马牛不相及，亏作者编得出来。看来作者心目中大英雄，文革必然被造反派整个七死八活，就像流行的革命履历，把挨过造反派整，弄得像挨过地主的皮鞭、鬼子国民党的枪子儿一样，否则就不是一贯正确的。

（七）

造反派的确把许多干部整得惨，但他们被坑得更惨。王大宾奉中央文革之命到成都抓彭德怀，听彭总几番真情道白，发现完全不是原来听说的那回事，对彭总深感敬佩和同情，竟然拒绝执行命令。后来把他抓捕关押，头号罪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文革后判他的刑，头号罪状又变成“诬陷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欲加之罪，有荒诞甚于此乎？北京钢铁学院20来个学生的5.16兵团写大字报反周恩来，生病住院的王大宾知道后立即给总理和邓颖超写信，表示保卫总理的决心，邓颖超回信称“你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真使我们感动”。白纸黑字摆在那里，还是硬给他扣上“搞反革命政变，反对周总理”的帽子，在暗无天日的私牢里一关就是两年，几乎丧命。颠倒黑白，有甚于此乎？未婚妻什么事都没干过，仅仅因为是他的未婚妻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也几乎被整死。株连所及，大山沟里的母亲都不放过，沾亲带故无一幸免，连小学中学的同学、儿时一起放牛的伙伴都被审查交代“5.16”问题。

王大宾在回忆录中披露，5.16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出来后，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组织均立即表态坚决反击，并把5.16几个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周恩来表示：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下令放人。够大度吧？后来他又说，是不是5.16参没参加组织不重要，“罪行就是本质”，“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够厉害吧？事实上绝大多数受害者是被安上这个罪名后才听说5.16的，大多数抓5.16的人也不知道它为何物，不过视为造反派的代名词罢了。运动中北京高校成千上万师生关押审查，全国上千万人受牵连，300万人打成5.16分子，手段之残忍，时间之漫长，株连面之广，逼死人之多，超过文革所有运动。

造反派本质上是体制外的势力，毛泽东无论有多少疯狂的想法，也不可能摆脱体制而另铸天下。他知道这个体制下产生的民怨，也深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国民性，他利用民怨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但不可能改变制度本身，因为他是体制的创建者，同时也是体制的产物，脱离了体制他就什么也不是。用他自己爱说的话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他的目的是否完全达到，他最终必然回到原点。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的官僚和原强势社会群体构成的保守势力变本加厉的响应是必然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的结局也是必然的。这里没有逻辑，不讲道理，没有法律，不择手段，只有利益。有的干脆就是赤裸裸的屠杀。有如1968年广西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以致发生骇人听闻的吃人肉运动。云南的“滇西挺进纵队”案、内蒙“内人党”案等，也是以造反派为目标的屠杀冤案。

同样是打砸抢整死人，造反派与保守派处理也大不相同。造反派武斗中有“血债”的一律逮捕法办，打死人的偿命，打伤人的或偿命或坐牢，就算罪有应得吧。那为何“红色恐怖”中打死人的、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杀人吃肉的（广西4.22事件）没听说偿命的？武斗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行为（杀俘不算），有如两军交战，打死人国际公法都是不定罪的，后者等等则属于屠杀，正当严惩。为什么？因为阶级敌人该杀，犯上作乱的造反派该杀。

（八）

造反派不是文革后、而是文革中就落难了。造反派组织1966年10月以后在全国大规模兴起，至1968年10月中央命令取缔，总共风光了两年左右。其间1967年1月颁布的公安六条，就成为各地镇压造反派的口实。紧接着的“二月镇反”造反派遭到大规模镇压，四川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有近10万造反派投进监狱。1968年以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5.16、批无政府主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无休无止的整造反派，无论谁倒台，造反派都跟着遭殃。陈伯达是中央清查5.16专案组组长，倒台后却成了5.16的“操纵者”；林彪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一个都不能放过，林彪死了照样整。抓四人帮华国锋主政，又来一个“清查帮派体系”，把造反派和四人帮绑在一起打成“帮派分子”，从体制内彻底清除。邓小平主政，又来一个“清查三种人”运动，公开宣布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实际上只清查“造反起家”一种人，把已经整得七死八活，查得底朝天的造反派头头正式逮捕，重新判刑。保守派派性再严重也不查，刮“红色风暴”的红二代开始接班。地富反坏右都摘帽了，造反派的帽子越扣越重，形象抹越黑。

当年的“走资派”说起文革字字血声声泪，实际上大规模批斗干部只在文革初期一年多时间，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保守派）转入内斗后，就顾不上他们了。开始整造反派，大多数当权派的日子就一天天好起来。九大以后干部逐步解放，70年代陆续恢复了工作。七十年代末以后，绝大多数干部彻底解放官复原位，罹难者平反昭雪。他们文革中受迫害的经历，成为革命生涯中的光荣一页。其实他们中许多人文革前历次运动制造的冤案，并不比造反派少。文革十年，造反派被整了七八年，文革后继续整，永远背着罪恶的十字架，半个世纪过去了也不给个说法，一想整人就拿出来说事，你说谁付出的代价更大？

王大宾文革前是预备党员，根红苗正，品学兼优，还未毕业就当干部使用，如果不是文革，前程一片光明。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造了两年反，没打过人，没组织参加过武斗，没有任何可以入罪的行为，结果关押审查坐牢13年，开除党籍公职，妻离子散，葬送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不过，比起那些高呼着“完蛋就完蛋，为毛主席而战”死于非命的少男少女、在一轮接一轮凶残的报复清算中泯灭的冤魂、一生都被毁掉的千千万万造反派，王大宾还算幸运的，他毕竟还有个有所作为的后半生和活得有尊严的晚年。

（九）

其实文革老干部中最为不幸的，是一批被造反派认可者。他们多半是文革前历次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他们对整人的当权派耿耿于怀，对历次运动造成的灾难有切身体验和更深的认识，文革中响应中央号召起来揭发翻案，被造反派视为受走资派迫害的干部给予认同和保护。西南头号当权派李井泉是四川大饥荒的重要责任人，四川干部对其不满者和反对者众多，文革中群起揭发批判。当年在北大东方红避难告状的四川干部主要就是这样的人。如向中央揭露四川饿死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一贯反李井泉的邓垦（邓小平弟弟）等。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称李

井泉为“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走资派，这批干部被造反派视为好干部，解放较早，有的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工作，从而与失势的当权者形成势不两立。造反派挨整，他们就成了“黑后台”跟着倒霉，如莫须有的“三老会”冤案，就使一大批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认可的干部惨遭劫难。

李井泉“文革”后期复出，1975年再次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与其同时打倒的干部纷纷复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轮番被清洗。文革后清理“帮派分子”和“三种人”，这批人基本上被清理出局，有的长期关押审查。如七千人大会写匿名信控告省委推行极左政策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文革中任省委宣传部长，“文革”后清理“三种人”，被打成四川“小四人帮”撤职审查；因揭发万斤田造假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箴、农工部长申培林，文革在造反派支持下恢复工作，后来长期关押审查，致死不做结论，郁郁而终。如此等等，全国皆然，居然被历史忽略。

文革这本大书还够得读，不是一面之词的“彻底否定”能糊弄过去的。相信读了《王大宾回忆录》，你会明白更多。

□ 原载《共识网》

~~~~~

## 【劫后反思】

提防人性

• 罗点点 •

说自己不愿反思文革其实不需要太大勇气。用德国电影《缄默的迷宫》引出“父亲是纳粹”的话题也没什么新鲜。高兴的是有人提出前述两文中我提供的有些史实不够准确，并因此引出了我真正关心的话题。

被纠正和补充进来的内容非常有趣。比如法兰克福审判中的重要人物鲍尔并不是如我说的大法官而是黑森州的检察长。他由于一手策划导演了这个审判，成为战后德国民族悔罪的关键人物。但是，他虽然以一己之力撬动了整个民族的反思，却引起过舆论的广泛争议。鲍尔多次与外国情报机构（以色列摩萨德）私下沟通，虽说是为追查纳粹战犯，但却犯了公职人员之大忌。有段时间他因此被称为“国家公敌”。媒体还“人肉”出他是同性恋，查出他这个社民党员在纳粹监狱里写过自首书，并因此被释放……。1968年，鲍尔莫名其妙死在自家浴缸中，是意外还是杀害？是自杀还是他杀？莫衷一是，沸沸扬扬。

知情者们还谈出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为世界舆论熟知，令人发指的纳粹罪行故事“人皮灯罩”的背后，柏林墙倒掉之后对开枪士兵定罪时，法官曾“说服”了很多人的“枪口为何不抬高一寸”的说法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隐情，甚至还有以正义的名义故意制造出来的冤案。很多事实表明，不论当年德国民族对二战罪行的忏悔，还是东西德统一后对集权统治的审判，以及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和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倒台之后，以民主和正义的名义开展的对既往罪行的清算中，都有出于现实目的或历史原因的幕前幕后的推手，有复杂的权力博弈和党派之争。哪个过程中都有人性幽暗的顽强表现，都不是单纯的公理战胜或者善良愿望使然。当然更不像国内有些公知一厢情愿、一知半解的说法：是源于赎罪和忏悔的宗教文化。

有人说：“遏制文革基因的恶性扩散，创造对其彻底清算的条件，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范式转换带来的普遍脱魅和觉醒。”“范式转换”不论，“普遍脱魅和觉醒”则似醍醐灌顶，使我认为对自己在文革反思中“退守人性底线的底线”的说法进行商榷和匡正很有必要。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多年争论不休。在沉思和反省中多有使用，情景不同导致用法不同。

孙立平教授在其 2016 新年献辞中说：……改革？开放？发展？繁荣？这些都不想说了，我期待的是人性的复苏。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分清是非对错，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明辨世界和文明的走势。这样才不会迷失。没有人性的回归，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孙先生在这里使用“人性”的方法，与我“退守人性底线的底线”中的使方法相同，故而深以为然。他说“这里说的人性，不是说人的本性。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惯说法的人性，是和通常所说的“没有人性”、“泯灭人性”相对应的。”

但要说到“普遍脱魅和觉醒”，我觉得还有人性的另一种解释似更妥帖。

去年至更早，以色列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著《人类简史》全球热销，二十多个国家购得版权，还变成了热门的大学课程。书的副标题为：从动物到上帝。厚厚一本书从十万年前开始到二十一世纪，说的是人类如何从动物进化成了人。书以认知、农业和科学三个革命为线索，解读或者说结构了文明发生史。书中诸多叙述和考证均有意无意指向了“历史无正义”的判断。按这个逻辑，人性中的野蛮是天赋自然。所有的人类罪恶：贪婪、懒惰、欺诈、暴力、掠夺、杀戮、战争，都和人的动物性有关。而人类迄今取得的文明成果：家庭，伦理、道德，法律、宗教、艺术，民族、国家、政党，甚至资本、金钱、契约等等等等，都是人为了控制自身的兽性和野蛮，说得更好听一点是压抑人性中的黑暗。即使到了今天，互联网、人工智能、宇宙航天，人类也许具有了神一般的创造能力。但是，人性仍然蒙昧，文明与野蛮的争斗并不成功，人类仍然不知道自己是谁和要去哪里。

无论察问历史还是观照现实，这种将人性追溯至原点对迄今文明成果的有限解释，都显现出更多的脱魅和觉醒。这种立场和角度恐怕很有利于在文革反思中的拓展格局，辨认细节，警惕危险。尤其当以文明、正义、高尚或其他美好名义下的龌龊勾当发生的时候。

在生而为人之喜悦之余，人要懂得提防本性中的野蛮。要明白自己是很容易被生存不宜，资源短缺，被理想化的意识形态，被专权的坏制度分分钟野蛮化的物种。当我们（不仅是像在文革中那样）密告攻陷，人伦湮灭，嗜血成性，相互屠杀，虽然一定是理想和制度都出了大问题，但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出了大问题。提防自身本性中的动物之恶、平庸之恶、……之恶，可能永远是必要的功课。在反思历史罪恶时的不激进，不媚俗，不在占领道德高地后形成新的罪恶和伤害，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恐怕得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相当费心费力地保持本性中并不强大的文明自觉。才能在辨识好制度坏制度的同时，辨识出好自己和坏自己。再把话扯远一点，许多人对当下 ISIS 的恐怖勃兴相当不解，将他们简单地归纳为“非人”其实缺乏说服力，但如能追溯到人性的野蛮是不是就能顺理成章些？当下大国争霸，战祸频仍，难民凶猛，文明塌陷，不凭借这种对人性的理解，我们这些脆弱的人，怎能找到更多生活下去的理由呢？

研究文革，如徐友渔先生所说，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说、工具和方法。他在《文革研究之一瞥》文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有些研究者在解释文革中的一些重要现象时，爱一下子就追溯到文化传统或人性的源头。我不相信，两千多年前的孔孟要为文革中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人用宗教的眼光看问题，在历史责任问题上力求深刻，认为罪过的根源不是具体事件的

当事人，不是文革的发动者，“我们有原罪，罪恶深藏于每一个人心中”。我认为宗教伦理学原则在这里不适用，这种“深刻”与其说是在深入认识罪恶的根源，不如说是把罪恶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而模糊、淡化甚至解脱了文革发动者直接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要是能对号入座，分明我就是那个带引号的“深刻”者。但转念一想，差矣，差矣！先生说的是文革研究，专家所司。而我在三篇小文中一直念叨的是文革反思，大众所为。故而，专家在研究中抓住文革发动者的直接责任。大众在反思中彰显人性的脱魅和觉醒，要能这么相互呼应携手共进一回，就是件天大的好事了吧？

我是不是该把在艰难时世中的自保箴言，从“退守人性底线的底线”换成“提防人性”呢？不仅字少好懂，更低的起点是不是也能更易得而安全？

点点 2016 年 1 月 30 日

本文获益于以下资料：

- 1，《人类简史》作者：（以）尤瓦尔·赫拉利 中信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第一版
- 2，孙立平：“关于人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西祠胡同 [www.xici.net/d227364876.htm](http://www.xici.net/d227364876.htm)
- 3，徐友渔：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 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465.html>
- 4，徐贲：战胜法西斯是怎样的历史进步 -搜狐文化频道  
<http://cul.sohu.com/20160117/n434774058.shtml>
- 5，徐贲：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 财新博客-新世纪的常识传播者-财新网  
<http://xuben.blog.caixin.com/archives/73995>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